臺大歷史學報第 44 期
2009 年 12 月，頁 153-194

BIBLID1012-8514(2009)44p.153-194
2009.4.6 收稿，2009.12.22 通過刊登

德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1941-1945）*

陳　彬**

提　要

二十世紀 30 年代，中德雙方曾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合作密切，然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希特勒對華政策改弦易轍後，雙方合作關係就蒙上一層陰影。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各主要參戰國家無不致力於在第三國建立情報網，加強從事軍事、政治與經濟情報的間諜行動。中國地處東亞大陸中心，又是西方政經勢力匯聚之處，對德國情報工作而言，不僅具備了良好的開展條件，同時也提供了理想的活動場域。

本文旨在探討在德國的國家戰略布局中，其在華軍事情報機關的發展與情報活動，特別是 1941 年後在日據中國地區內從事的情報工作。雖然 1941 年 7 月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導致重慶國民政府對德斷交；同年 12 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對德宣戰，更將雙方僅存的經貿關係劃上休止符。但在德國軍事當局考量上，由於中國戰略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以及國民政府是當時極少數可與英、美、蘇西方盟國政府高層聯繫的國家等因素，因此在蒐集與戰爭發展有關的「軍事情報」上，中國地區作為遠東情報工作的基地，對德國軍事情報組織而言，都別具有戰略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軍事情報機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　情報網　國家戰略　軍事情報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NSC 96-2411-H-001-031）的研究成果。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E-mail: chen9@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德國在華情報活動的緣起與軍事情報組織的發展
三、「艾爾哈特機關」在華的情報工作
四、德國投降後「艾爾哈特機關」在中國的情報活動
五、結論

一、前言

1946 年 4 月 16 日，上海《申報》刊載一則新聞：

> 駐滬美軍當局發表消息，經多日偵緝，已破獲戰時德國納粹黨在華所組間諜網，首腦人物艾爾哈特中校等德、日籍人犯十九名，均經捕獲。該組織係德國陸海軍當局遣派來華，在亞洲區活動之特工分子。德國投降後，該組織仍繼續運作，協助日軍對盟軍採敵對行動，於北平、上海等中國沿海大城市設立工作站，美艦多艘沉失，均與該組織活動有關；且曾潛入重慶，刺探進入自由區之路線等。被捕各德籍戰犯，均受特殊訓練後經由潛艇輸送來華，經此次搜捕後，納粹在亞洲殘餘分子之行動，當可肅清。[1]

此則新聞披露出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即其在華情報活動與軍事情報組織的發展。事實上，早在 1937 年 7 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德國軍事情報主管機構——國防軍總部軍事情報局（Amt Ausland / Abwehr, OKW；以下簡稱軍情局）即派人赴滬，秘密成立「工作據點」（Post Shanghai），主要負責東亞地區情報傳遞與蒐集西方各國的海事情報，成為日後德國在華情報組織的雛型。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不僅致力於歐洲戰區，更著眼在第三國建立情報機關，加強從事攸關戰爭發展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的情報蒐集與間諜活動，以作為國家預測戰爭趨勢、籌劃與制定戰時政策的重要依據。

1 《申報》，1946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第 3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地理位置而論，中國地處東亞大陸中心，又是西方政經勢力匯聚之處，對德國軍事情報當局而言，中國地區不僅具備了開展情報工作良好的條件，更提供了理想的活動場域。雖然中德雙方從 30 年代起，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發展密切的軍事與經濟合作關係，不過，雙方的合作關係受到 1937 年 7 月日本侵華戰爭，以及 1938 年 7 月希特勒（Adlof Hitler, 1889-1945）下令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而蒙上一層陰影。直至 1941 年 7 月，德國在日本壓力下承認汪精衛政權，導致重慶國民政府對德國斷交；同年 12 月珍珠港事變後，國民政府繼英、美政府之後對德宣戰，更將雙方僅存的經貿關係劃上休止符。

縱使雙方不再保持外交與政經關係，但無論從中國戰略地理位置的優越性，或是從國民政府為當時極少數可與英、美、蘇等國政府高層聯繫之國家的事實來考量，在德國的國家戰略布局中，中國地區作為遠東情報活動的基地，對德國情報工作而言，仍極具吸引力。因此隨著德國在歐洲軍事行動的擴展，自 1941 年底起，其在華情報活動亦逐步跨越地域性而組織化，進而整合成為體制與功能齊備的軍事情報機關。綜觀戰爭期間，不論是蒐集與戰爭全局發展有關的「戰略情報」，或是涉及軍事行動上的「戰術情報」，在華軍事情報機關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德國軍事情報組織都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與價值。[2]

有關納粹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或是中國的情報組織活動研究，對於目前東西方史學界而言仍是相當陌生。1977 年，Donald M. McKale 所撰 “The Nazi Party in the Far East, 1931-45”，首開相關研究風

2 軍事情報是指關於國防與軍事方面的情報，就其使用價值而言，又可分為「戰略情報」和「戰術情報」兩個層級。戰略情報是指能提供國家預測未來，以及籌劃、制定和執行政策所需的情報，是一個國家制定軍事方針與政策的重要依據。在戰爭時，則是指有關戰爭全局的情報，包含國家軍事、政治、經濟、科技以及社會等各方面的內容。戰術情報則通常涉及與軍事行動相關的軍事設施、裝備、組織以及作戰計畫等情報，亦稱之為戰鬥情報，它與戰役的成敗有直接關聯。參見 Abram N. Shulsky and Gary J. Schmitt,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2), pp. 54-55.

臺灣本土學術期刊資料庫

氣，對納粹黨海外組織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提出通觀式的論述。[3]而近期較深入的研究論著則為 Bernard Wasserstein 的 *Secret War in Shanghai*（《上海的秘密戰爭》）與 Astrid Freyeisen 的 *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上海與第三帝國政策》）。[4]後兩本論著處理的中心議題雖不相同，但共通點在於觸及戰爭期間德國在上海的情報戰這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不過兩者有關情報戰的研究重心均聚焦於上海地區的情報活動，對於德國軍事情報組織在淪陷區的情報工作則欠缺整體性的討論。

本文主要利用美國國家檔案室（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德國外交部檔案室（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室（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以及我國國防部檔案作為研究基礎，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在詭譎的國際關係架構下，其在華軍事情報機關的發展與情報活動。特別是 1941 年後，該機關在淪陷區內從事的情報工作，到德國投降後與日軍的合作關係，以及戰後機關成員以戰犯罪名遭美軍起訴審判的歷程，藉此闡釋在德國軍事戰略布局中，其在華軍事情報機關作為遠東地區情報工作中心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二、德國在華情報活動的緣起與軍事情報組織的發展

納粹黨執政後，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情局主要負責對外軍事情報蒐集以及情報人員的指揮、調遣與組織工作。其中第一處主管國

3 Donald M. McKale, “The Nazi Party in the Far East, 1931-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2:2 (1977, London), pp. 291-311.

4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Astrid Freyeisen, *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Würzburg: Könighausen & Neumann,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情報工作，下轄陸軍情報（I / Heer）、海軍情報（I / Marine）、空軍情報（I / Luftwaffe）、情報科技（I / Technik）及經濟情報（I / Wirtschaft）等科；[5]東亞地區情報工作則分屬於陸軍情報科東方組（I / Heer Ost）與海軍情報科東方組（I / Marine Ost）的業管範圍。另外，軍情局在全國 21 個軍管區以及佔領區中，各成立一個附屬於司令部的「情報組」（Abwehrstelle），在國外地區（包含中立國）則設立所謂「情報機關」（Kriegsorganisation, War Orgnization, 簡稱 KO）的情報組織（參見附表一）。第一個海外情報機關是在 1937 年 2 月西班牙內戰期間於馬德里成立，至 1942 年 5 月為止，在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芬蘭、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等地首府與北非卡薩布蘭加、安卡拉以及上海，總共有十個海外情報機關次第成立。在國外地區設立的情報機關，與國內以及佔領區中的情報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為一非官方組織形式，因此它的情報活動以低調與隱密為原則，避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外交紛擾；同時，工作人員在形式上均納入外交系統編制內，以為掩護，主要任務是觀察駐在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情勢。雖然各個海外組織規模大小各異，不過其內部組織架構與各軍管區情報組相同，都直接受軍情局指揮。[6]

事實上，軍情局並非唯一在中國從事情報活動的德國情報單位，黨衛軍（SS）系統的國家安全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國外情報處（Ausland-Sicherheitsdienst, SD）亦曾涉入東亞地區的情報工作。國家安全局在華情報活動最早以克拉勒（Dr. Paul Rudolf Klare）為首，1940 年以前，克氏在東北地區以「德國通訊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DNB）記者身分活動，後至上海新聞處服務，[7]專事蒐

5 軍情局另有第二處負責秘密行動，第三處主管反情報工作。

6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Da Capo Press, 2000), pp. 243-244.

7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p. 65-66; Charles Lane, "Shanghaied," *The Green Bag* (2D Series, Vol. 7), No. 3 (2004, Boston), pp. 248-249. 1939 年歐戰爆發後，德國外交部為強化國際宣傳，於 1941 年春派員至上海建立「德國新聞處」（Germ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有關英美情報活動、[8]蘇聯情勢發展、德國在滬商界與重慶間商業活動，以及「自由法國」（Free French）地下組織在上海地區的反德宣傳活動等情報。[9]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凋敝，隨之威瑪時代（Weimarer Zeit, 1919-1933）政治動盪不安，以及 20 年代末的世界性經濟蕭條，更造成德國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致使不少德國人移民至中國，尋求商機

Information Bureau），辦公室設在國際飯店 16 樓。負責人普特卡默（Jesco von Puttkamer）戰前曾在美國從事廣告行銷，1940 年接受情報訓練，轉調至外交部宣傳部門服務。該新聞處首要任務是延續柏林官方宣傳路線，不僅將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向遠東以及英美地區傳播，同時進行反美宣傳，並助長其國內孤立主義氛圍，意欲影響美國在戰爭中的中立立場。而上海為一國際性都市，對納粹而言，不啻為納粹向美、加、拉丁美洲與亞洲國家宣傳的最佳處所。美國參戰後，普氏的機構以印行宣傳手冊與海報等文宣方式，公開攻擊美國，並以短波電臺向澳洲、印度、法屬中南半島、重慶國民政府、蒙古與蘇聯等地區進行宣傳戰。1944 年 10 月，普氏並與在華日軍宣傳單位達成協議，雙方協同合作，直至戰爭結束為止。

8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以下簡稱 PA），PA, Inland IIg 76, Fiche 1926, Heydrich an Auswärtiges Amt, 28 June 1940; PA, Inland IIg 76, Fiche 1926: China/Shanghai: Tätigkeit des SD, der Abwehr und Polizei-Attaches, Telegramm Altenburg, 15 June 1940.

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NARA）, Germa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Strategic Services Unit Memorandum, 1 March 1946, p.79; NARA, RG 226, entry 211, box 23, “China Theater, X-2 Branch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Theodor Siefken, head of the Abwehr I. M. in Shanghai from 1940-1942,” 16 October 1945, p. 4. 「自由法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領導的反納粹德國侵略的抵抗組織。緣起於 1940 年 6 月法國戰敗投降後，戴高樂在倫敦發表〈告法國人民書〉，呼籲人民繼續抵抗德軍佔領，標誌「自由法國」運動開始。同年中，以法商埃噶（Roderick Egal）為首，在上海也成立了以「自由法國」為名的地下組織，暗中接受英國駐華大使館的資助。該組織的主要目的是以文字方式進行反納粹宣傳，宣揚由戴高樂領導的反抗組織之理念；此外，該組織並在上海成功召募了 65 名法籍僑民與原法租界區警察，參與由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部隊。1941 年中，埃氏遭維琪政府（Vichy Regime）逮捕，該組織雖由考夫曼（Georges Rivelain-Kauffman）繼續領導，但珍珠港事變後，在日本軍方嚴密監控下，該組織在上海的宣傳活動即被迫轉趨低調。參見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p. 75-77.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與個人條件與經驗相稱的工作，並在許多沿海城市中建立了德式文化生活圈。因此 1938 年起，國家安全局在德國大使館上海辦事處中設置由秘密警察官員擔任的警察連絡官（Polizei-Verbindungsoffizier），[10]主要任務在於監視僑民中所謂反納粹政權人士的言行與當地德文媒體輿論。當時在華的大部分德國人居住在上海（約 2,000 人），除了外交官對於德國採取向日本傾斜的外交政策表示疑慮，認為將損及德國在華經濟利益外，[11]德商基於不想失去商業利益與擴展中國市場的機會等經濟原因，對政府的親日政策也多持批評立場。特別是自 1936 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的貿易出口超過英國，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然而希特勒承認滿洲國（1938 年 2 月）和撤離軍事顧問（1938 年 6 月）等親日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卻使德國先前在對華經濟方面所做的努力蒙上一層陰影。

針對在華德僑的反應，納粹黨海外部（Auslandsorganisation der NSDAP, 簡稱 AO）[12]領導人波勒（Ernest Wilhelm Bohle, 1903-1960），曾寫信給納粹黨在華黨部負責人拉曼（Siegfried Lahrmann），提醒他管理海外德僑的職責：

---

10 PA Inland IIg 76, Fiche 1926, Himmler an Auswärtiges Amt, 30 March 1940; Kaltenbrunner an Auswärtiges Amt, 23 April 1943. 德國首任駐上海秘密警察連絡官為溫道夫（G. Wendorff），1940 年 6 月則由康納（Gerhardt Kahner）繼任，1943 年 3 月起改稱「警察武官」（Polizeiattaché），由胡伯（Franz G. Huber）少校出任。當時德國在遠東地區僅派遣兩名秘密警察官員，一名是駐東京大使館的邁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他是國家安全局第四處秘密警察（Gestapo）駐遠東地區最高首長，康納與胡伯則是中國地區負責人。

11 Erwin Wickert ed., *John Rabe: Der gute Deutsche von Nanking* (Stuttgart: DVA, 1997), p. 346.

12 Bundesarchiv Berlin（以下簡稱 BA Berlin）, R 187/293, Anordnung 66/35, 15 April 1935, pp. 1-5. 1931 年 5 月 1 日，納粹黨於漢堡成立納粹黨海外事務處，目的在於管理與協調在海外的納粹黨黨務組織與團體。納粹黨執政後，該單位直屬於黨副主席領導。1934 年 2 月改稱為海外部，是所有境外黨員的主管機構。1937 年間，納粹黨在海外共成立 548 個分部（Ortsgruppen），分屬於 45 個總支部（Landesgruppen）與支部（Landeskreisen），中國總支部機構位於上海。參見 BA Berlin, NS 9, Die Auslandsorganisation der NSDAP, pp. 3-5.

臺灣藝術 期刊資料庫

> 德國國民的義務在於無條件支持領袖的日本政策，並承擔由此政策所引起的經濟損失。上海的國人個人對中國人的同情與財物的損失絕不可置於領袖偉大的政策考量之上。因此應不惜任何代價，避免給日本人與中國人留下上海的德國國民與政府觀點歧異的印象。[13]

其中反映出在華德商對德國政府之中國政策的不滿情緒。

而自 30 年代中起，納粹政權的排猶政策導致另一波德籍猶太難民移民上海，因此，監控上海猶太難民的社會生活也成為秘密警察另一項重要任務。[14]尤其是上海的猶太人在商業領域上居於主導地位，不僅高級俱樂部是由猶太人經營，幾乎所有的汽車買賣與德國公司的代理商也都掌握在猶太商人手中。[15]不過，秘密警察在執行監控僑民的任務上，並未獲致預期中的效果，因為日本軍方從未容許德方在其控制地區內，對德籍人士行使任何調查權或干涉行為。事實上，秘密警察存在這一事實的象徵意義遠超過它的實質意義，其主要是在上海德籍社群的心理上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16]

德國軍方情報單位在中國的情報活動，最早則可追溯至 1926 年，其情報人員為舒爾策（Adalbert Schulze, 1903-1944）。舒氏以德國漢堡羅氏企業（Rowoldt & Co.）在華分公司主管身分，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掩護。同時，該公司僱有 25 名員工（其中大部分是華人）從事情報蒐集工作，主要任務是蒐集蘇聯在東北的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活動等方面的情報。羅氏靠著長期建立的情報管道，與利用白俄反抗組織滲透蘇聯官方機構的方式獲取上述情報，並以外交郵件方式傳遞回德國。[17]直至 1944

13 PA, R 27198, Bohle an Lahrmann, 18 June 1938.

14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以下簡稱 BA-MA）, R58/2026, Bericht Geheime Staatspolizei, 12 September 1939.

15 BA Berlin, R9208/4637, Deutsche Botschaft Peking an Auswärtiges Amt, 20 June 1941, p. 2.

16 NARA, RG 226, entry 182, box 28, folder 152, pp. 86-87.

17 NARA, RG 226, Entry 212, Box 5, “China Theater, X-2 Branch” Report regarding the German intelligence network in Manchuria, China, 5 March 1946, pp. 1-3. 舒爾策利用哈爾濱的白俄協會（White Russian Emigrant Bureau）協助，蒐集有關美國運往蘇聯運補船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5 月調離東北回到北京為止，舒氏在東北地區從事情報活動期間長達十八年。

1935 年起，德國軍情單位也曾分別派遣情報員至日本與中國，進行反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宣傳及情報活動。[18] 1937 年 7 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德國軍情局第一處即正式派遣情報官員赴滬成立「工作據點」，並建立了秘密電臺。不過，在成立之初，該據點限於人力與設備，僅具有情報組織的雛型，尚未具備海外情報機關的規模；且情報活動侷限於地區性、小規模運作，並未發展成為跨區域性的組織活動。該據點主要負責東亞地區的情報傳遞與蒐集西方各國的海事情報，同時監控經由上海出口西方的戰略物資。當時上海作為一個亞洲國際航運與貿易集散港市，自然成為德國情報組織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發展據點。不僅因上海位居東亞海岸線上第一大商港，更由於歷史因素，當地集結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航運公司，即使在戰時，各國註冊的船隻在此依然航行無阻，儼然成為西方在華最大商貿、航運及製造業的投資中心。上海同時也是中國經濟金融中心以及國際人士群居的城市，市內有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即英美租界）、日本與法國等租界區。[19]租界

數量的情報。基於經濟因素考量，白俄協會同時接受日、德雙方情報單位的資助，從事蒐集蘇聯情報，其主要負責人為斯密諾夫（Atamen Semenoff）。

18 Julius Mader, *Hitlers Spionagegenerale sagen aus: Ein Dokumentarbericht über Aufbau, Struktur und Operationen des OKW-Geheimdienstamtes Ausland/Abwehr mit einer Chronologie seiner Einsätze von 1933 bis 1944* (Berlin: Verlag der Nation, 1983), pp. 306, 312.

19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依照 1842 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在 1843 年開闢為中國五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英國（1845）、美國（1848）與法國（1849）陸續在上海設立了居留地。隨後英美租界合併（1863），外國人來滬漸多，1865 年人數超過 2,000 人，1895 年則超過 5,000 人。1899 年，英美租界改稱上海國際公共租界。此後，在上海形成了二個租界與中國地方政府分割管理的局面：今上海市黃浦、靜安以及虹口、楊浦四個區，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以英美為主），長寧區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區，盧灣、徐匯兩區主要是上海法租界，而閘北區和原南市區兩片中國管理的區域（華界）則被租界分割為互不相連。其後上海外籍人數增加迅速，1905 年超過 1 萬人，1915 年超過 2 萬人，1931 年則超過 6 萬人。中日戰爭爆發，日本人大批湧進，上海外僑總數迅速膨脹，1942

的存在，使得上海大部分地區未受戰火波及，並享有實際獨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國際聯繫，成為情報活動與情報蒐集的理想場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參戰各國無不於各交戰地區建立並強化情報網，以從事蒐集敵方軍事、政治與經濟情報的間諜行動。

1940 年，隨著大西洋海上封鎖與商業戰爭[20]日益嚴峻，德國軍方開始考慮在太平洋區域打擊敵人戰時經濟的可能性，特別是上海、廣州與馬尼拉等幾個港口，是英國航運界在亞洲最常利用的主要商港。[21] 1940 年中，柏林方面由日本獲得英國計畫從上海等港口輸運鎢、錫與錳等戰略物資回英國本土的具體情報，因而規劃在東太平洋地區攻擊英國船隊的作戰計畫，並派遣偽裝成商船的突擊艦（Handelszerstörer）經由北極航線，穿越白令海峽，進入太平洋搜尋，攻擊航向英國的敵方船隊。[22]不

年達到高峰 150,931 人，其中日僑人數更超過所有其他外僑的總和。上海外僑國籍最多時高達 58 種，除日本僑民人數居首位外，其餘依次為：無國籍俄人、美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德國（1942 年達 2,538 人）等。外僑在上海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其次是法租界，英、美、德、日等國僑民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英美宣戰，日軍隨即佔領公共租界，由於當時法國維琪政府已經向德國投降，日軍並未佔領上海法租界。《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頁，〈上海外事志〉，上編：第 2 篇，1-3 章、第 6 篇，1 章；下編：第 2 篇，2 章（http://www.shtong.gov.cn，2009 年 3 月 11 日檢索）。

20 商業戰乃經濟戰的一種方式，主要是透過海上封鎖敵方航運與貨物進出口，扼殺敵方對外貿易的戰爭行為。

21 Paul Leverkühn, *Der geheime Nachrichtendienst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m Kriege* (Frankfurt a.M.: Bernard & Graefe, 1960), pp. 179-180.

22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擁有 11 艘突擊艦，總共擊沉 136 艘敵方商輪。這些船艦原本為商業輪船，經改裝後，配備大砲、槍砲、魚雷以及偵察機，更載有各式的偽裝配備，可以偽裝成多種無武裝的商船。其中獵戶星（Orion）號，排水量 7,021 噸，速度 14 節，配備艦載偵察機 1 架，6 門 150 釐米主砲，1 門 75 釐米砲，6 管魚雷發射器，曾於 1940 年 4 月 6 日偽裝成荷蘭商船，進入太平洋海域，進行商業戰；6 月 13 日抵達紐西蘭外海布雷，後與慧星號於紐西蘭、澳洲海域作戰，直至 1941 年 8 月返回德國為止。突擊艦中噸位最小的慧星（Komet）號，排水量 3,287 噸，速度 15 節，配備艦載偵察機 1 架，6 門 150 釐米主砲，1 門 60 釐米砲，2 門 37 釐米快砲，6 管魚雷發射器，則於 1940 年 9 月 5 日通過白令海峽，進入太平洋，並在太平洋地區與獵戶星號一起執行商業戰行動，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過，海上軍事行動成功的先決條件，首在精確掌握敵方艦隻的航向與航線，以及其與鄰近航空基地無線電偵測的具體情報，以減低己方船艦遭受敵人空中攻擊的機率。[23]鑑於原有在上海的情報據點，在人力上已無法勝任即將面臨的軍事情報任務，柏林方面始考慮擴充該據點的組織規模，成為以上海為中心，而觸角擴及北京、天津、青島、廣州以及香港的情報網，以肆應商業戰所急需有關航運與船艦等方面的情報需求。

基於此項任務需求，1940 年 8 月，軍情局派遣席夫肯（Louis Theodor Siefken）至上海負責組建情報組織工作。席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服役於空軍，以上尉軍階退役，戰後曾於德國容克（Junker）航空公司服務，1924 年起受僱於航運公司，往來東非與歐洲間；1940 年 6 月，席氏被軍情局徵召，接受密碼、密寫以及微點照相技術等訓練。[24]席氏在德國大使館上海辦事處中以商務專員身分為掩護，直接受軍情局第一處海軍情報科指揮。席氏辦公室及其工作成員則藏身於四川路 261 號德國染料公司（Deutsche Farben-Handelsgesellschaft）大樓 5 樓。席氏所屬的上海軍情組織的主要任務，為蒐集西方國家在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商業活動及海軍情報，並透過媒體與僱用當地人士，在酒吧、俱樂部蒐集任何可能的訊息；另外，派遣情報人員潛入港口拍攝英美艦艇、標示船艦位

同年 12 月初，兩艦駛進澳洲東北方諾魯（Nauru）群島海域捕獵英國商船，直至 1941 年 10 月為止。J. P. Mallmann-Showell, *Das Buch der deutschen Kriegsmarine 1935-1945* (Stuttgart: Motorbuch, 1995), pp. 134-136.

23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im II. Weltkrieg: Ostfront* (München: Weltbild, 1989), pp. 345-347. 萊勒（Reile）中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職國防軍總部軍情局第三處，後於法國主管反情報工作，戰後進入西德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服務，以迄退休。

24 微點照相技術（Mikrofotokopie, 類似打字機打出來的句點），由德國發明，主要用於傳遞情報。它是利用微縮原理，透過照相方法，將文件、資料性情報縮小至數十或數百乃至數千分之一，製成微縮影像的技術，能把整封信縮小到一個句點大，在顯微鏡下放大兩百倍始能清楚辨識。這種含有情報的微縮化影像又被稱作顯微點、微點、密點等。Walter Schellenberg, *Hitlers letzter Geheimdienstchef* (Rastatt: Moewig, 1986), pp. 405-406. 雪倫堡（Schellenberg）少將自 1939 年起即主管國家安全局第六處（國外情報處）業務，直迄德國無條件投降為止。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期刊資料庫

置、蒐集新型船艦的最新動態、截聽船艦通訊與破解海事密碼等方式，蒐集英、美以及荷蘭等國的航運資料，提供海軍情報科分析外，同時也提供在東太平洋活動的德國突擊艦有關盟國艦隻航線的情資，並蒐集英美在亞洲地區防備日本的海軍軍力情報，以及日蘇關係發展等戰略情報。[25]

此外，上海除了作為傳遞情報的據點，確保情報安全地傳遞至柏林外，同時席氏也與上海日本海軍情報機關大谷上校（Otani Inaho）進行情報交換，並僱用義大利人從事船隻密碼通訊的監聽、截收以及破譯等工作。席氏並計劃建立一個包括南京、廣州、曼谷與瀋陽在內的電訊傳輸工作網，以規避敵方或日方的無線電偵測。不過，席氏於 1942 年 11 月被控同性戀罪名而被解除職務。席氏是軍情局派赴遠東地區的首位情報組織負責人，當時即便在德國的盟邦日本，亦無同性質的代表，德國駐日本大使館中僅派駐一名海軍武官負責協調與軍情局業務相關的工作。[26]

與此同時，軍情局第一處經濟情報科也曾指派情報官員艾森特雷格（Lothar Eisenträger）[27]來華。艾氏曾任軍情局保加利亞情報機關（KO

25 NARA, RG 226, Entry 211, Box 23,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Theodor Siefken, 16 October 1945, pp. 2-3; PA, R102049, Martin an Smith, 27 February 1941.

26 NARA, RG 226, Entry 211, Box 23,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Theodor Siefken, 16 October 1945, pp. 3-4; Gert Buchheit, Der *deutsche Geheimdienst: Geschichte der militärischen Abwehr* (München: List, 1966), pp. 280-281.

27 NARA, RG 242, German Army Officer Personnel Files, Personalakten für Lothar Eisenträger; RG 153, entry 1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War Crimes Branh box 1415, book 13, Statement Eisenträger, pp. 2058, 2185. 艾森特雷格 1896 年出生於萊比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三天入伍，1915 年 4 月晉任步兵少尉。大戰期間曾於東、西線戰場作戰，獲頒二級、一級鐵十字（Iron Cross, 2nd and 1st Class）以及金質負傷獎章（Wound badge in Gold）等勳章，戰後仍續留軍中，1920 年 3 月底始退役。他離開軍職後，曾任職對外貿易商業機構，其中比較特殊的經歷是 1930-1932 年擔任德國東亞與德華海外貿易公司（Deutscher China-Dienst）事業主管，之後曾擔任德國對保加利亞進出口煙草公司總經理。1935 年德國重整軍備後，艾氏曾申請復役進入機械化部隊，然因健康因素未能實現，後因其豐富的外事經驗，由軍情局召募而成為後備役情報軍官。艾

Bulgarien）負責人，於 1941 年 6 月德蘇戰爭前夕被派赴中國，艾氏乘坐西伯利亞快車抵達中國東北邊境城市滿洲里，僅 8 小時後，德國即正式進攻蘇聯。[28]同年 7 月，艾氏抵達上海，起初他的主要任務是督導執行 1936 年與中國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29]並受國防軍總部國防經濟署（Wehrwirtschaftsstab）委託，採購中國的戰略原料，如鎢砂、錳、錫、橡膠等，然後負責督運，先陸運經河內至中南半島，以避開英方的海上封鎖，再由德國貨輪載運返回德國。[30]在其上司對艾氏的工作評鑑上，曾有如下敘述：

氏當初考量到接受新職，一方面可繼續經營自己的事業，另一方面亦可從軍情局領到特別津貼，兩者兼顧；並且成為後備軍官後，加上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服役資歷，將來也可享有全額退休俸，因此接受軍情局提供的工作機會。1936 年底，他在柏林接受情報技術訓練，1937 年 10 月根據兵役法再度被徵召，晉任為後備役上尉，進入柏林第三軍管區參謀部，任職情報參謀，1940 年 4 月晉升為少校。

28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 359.

29 PA, Geheimakten 1920-1936, Ostasien: China/Handel 11, No. 3. 1934 年 1 月，德國在柏林成立「工業產品商業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簡稱 HAPRO），於 1936 年 4 月 8 日與中國簽訂「合步樓」（HAPRO）協定。依據該協定，德國提供中國一億馬克的信用貸款，中方可用來購買各種德國出產的物品，然後以中國出產的原料，如鎢砂、銻砂等物資沖銷貸款。貸款年息 5 厘，未動支的數目不必支付利息。這筆款項亦沒有規定清還的期限。由於德國實施外匯控制，因此雙方購物均不用現款，所以性質上是以貨易貨。協定中的德國物品，實際上中方所採購的都是武器裝備等軍事物資。當時為避免日方不必要的干涉，這個協定並非透過雙方外交系統，而是藉由軍方管道洽商而成。

30 1936 年，德國成為中國第三大的貿易夥伴，僅次於美日。1935-1937 年間，中國亦成為德國最大的軍火輸出國。而在大戰爆發前，德國亦為中國鎢砂最主要的進口國。Statistisches Reichsamt ed., *Sta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erlin: Schmidt, 1937-1939), Vols. 1937-1939; 程玉凰編纂，《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臺北：國史館，1984），上冊：「資源委員會抗戰時期工作概況」，頁 114-124。

年分	鎢砂輸出德國噸數	佔中國輸出比例%	佔德國進口比例%
1937	8037 公噸	48	70
1938	8962.2 公噸	79	63
1939	4000 公噸	62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員長年從事商業行為的經驗、所建立的國內外人脈、豐富的海外經驗以及國際視野，使得該員在經濟情報領域工作上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31]

艾氏來華的時間點正值中德雙方外交關係的轉折點，雖然 1941 年 7 月 1 日德國正式承認日本傀儡汪精衛政權，而國民政府隨即於次日與德國正式斷絕外交關係。但是 1936 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仍然在雙方默契下維持運作。德國急需中國的戰略物資，中國也需要藉由互通有無維繫與德國的官方關係。由於這個協定主要是雙方透過軍事管道所簽訂，艾氏既然隸屬於軍情局國外情報處經濟情報科，由他來負責繼續執行協定內容與蒐集經濟情報，顯然是合理的選擇。

不過，自珍珠港事變後，中國對德宣戰，艾氏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即宣告停滯。艾氏來華的任務表面上雖帶有經濟目的的色彩，然而這也是情報機構派遣人員潛伏工作時慣用的隱蔽作法。實際上，他由軍情局經濟情報科被派遣至上海，還肩負著另一項重要任務——蒐集蘇聯的軍事情報，特別是有關遠東地區的軍事情勢與戰略物資的分布情形。同時，柏林方面基於戰後國民政府仍將是德國重要商業夥伴的經濟考量，令艾氏與重慶國民政府維繫著既定關係。[32]雖然艾氏與席氏均隸屬於軍情局同處，其工作範圍也有部分重疊性，然而兩者之間並無垂直統屬關係或是橫向的工作聯繫，彼此間的權限也無清楚界定，而各自擁有獨立的情蒐管道與情報來源。

艾氏停留上海期間，最初下榻靜安寺路的上海國際飯店（Park Hotel, 今黃浦區南京西路 170 號），1942 年 2 月始搬遷至華山路 290 號的海格公寓（位於海格路〔Haig Avenue〕，今華山路 370 號靜安賓館〔Haig Court〕），直到 1945 年 5 月 18 日德國投降時為止。[33]

31 NARA, RG 242, German Army Officer Personnel Files, Eisenträger: Beurteilung, 1 January 1940.

32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0.

33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2, pp. 2005-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艾爾哈特機關」在華的情報工作

艾氏於 1942 年 10 月晉升中校，並接獲軍情局命令，於 12 月 1 日正式接管由席夫肯領導的在華軍事情報組織，[34]同時被授予整編該組織之權責，將原屬軍情局並以上海為中心的情報組織與各地情報網，整合擴編為一事權集中的海外情報機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35]當時整個遠東地區，除了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外，艾氏為國防軍總部派在中國最高階的軍官，也是遠東地區唯一的軍事情報體系代表。[36]

由於艾氏對外化名為魯德維希・艾爾哈特（Ludwig Ehrhardt），因此德國在華情報機關亦稱為「艾爾哈特機關」（Ehrhardt Bureau）。同時為工作方便計，軍情局與外交部達成協議，將所屬情報人員一律納入使領館中之外交人員編制，以為掩護。因此，雖然情報人員名義上隸屬於大使館，但情報機關的內部編組與人事政策並不受制於外館，而是直接受軍情局第一處處長皮肯布洛克（Heinz Piekenbrock）上校與經濟情報科布洛赫（Dr. Ernst Bloch, 1885-1977）少校指揮。[37]

艾氏就任後，其情報工作的重要舉措是對情報工作方向進行調整和改革。首先是工作重點的調整，他將過去進行商業戰的焦點轉移到加強對蘇聯的情報活動。此舉主要緣於 1941 年 6 月底，德國進攻蘇聯，因應新的軍事行動，開啟了在華情報機關情蒐任務的新階段。由於先前德艦穿越白令海峽進入太平洋地區的作戰行動，在德蘇交戰後已無可行性；海上商業戰的重要性也隨著希特勒向東擴張的軍事行動而銳減，同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後，正式為德國在太平洋地區進行商業戰的軍事行動劃下休止符。

---

34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 223.

35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09.

36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6, book 14, p. 2212. 駐日使館曾派一名少校助理武官常駐汪精衛政府，直至 1944 年 9 月柏林始派遣萊茵侯德（Wolfgang Reinhold）少校，經由潛艇運送至南京，擔任德國駐華大使館武官。

37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0.

臺灣本會宣術 期刊資料庫

既然原來針對商業戰的情蒐工作已失去意義，在華情報機關之情報活動的任務取向也必須隨著戰爭情勢改變而有所調整，以肆應新的國際情勢。在艾氏的任職命令中，軍情局明白賦予他執行在中國東北境內發展情報組織，以便蒐集蘇聯情報的主要任務，尤其是蘇聯與英美的合作關係、日蘇關係的發展，以及英美對日作戰與支援中國的軍事部署。此外，蘇聯介入中日戰爭的程度、透過運送戰爭物資與飛機以及支援軍事顧問等方式援助中國，及其對國民政府的影響、中日雙方在戰爭期間的政治與經濟情勢等，亦是該機關調查工作的重點。[38]

當時德國最需要的乃是在各方面深化對蘇聯情報作戰的基礎，因此對蘇聯進行情報蒐集的任務自然成為在華情報機關工作的重心。事實上，該單位對蘇聯情報工作的成效也相當可觀，無論是有關蘇聯遠東地區的糧食補給、交通狀況、人力與天然資源、河川海洋航行、海港運輸與政治情勢的情報，都相當具體深入。[39]據戰後艾氏向美軍供稱，該單位最主要任務即為對蘇聯的情報工作，其次才是蒐集英美在遠東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觀察日本軍事行動以及調查遠東地區天然資源等情資。

此外，鑑於日軍已佔領東北與中國東半壁領土這一事實，想要在日軍控制的地區中擴展情報組織與從事情報活動，在未取得日本軍方的同意與合作之前，幾乎不可能實現。因此，為觀察遠東地區未來戰爭情勢的整體發展，[40]同時在德日軍事同盟關係的基礎上發展情報組織工作，尋求與日本佔領軍協商，並將該機關在華情報工作定位於雙方合作的模式，成為德國在華情報機關採取的必要措施。

不過，由於席夫肯的去職與組織的整編，也使得原來德國情報組織與上海日本海軍情報機構的聯絡管道中斷，艾氏只得嘗試另闢蹊徑，與日本陸軍情報單位建立工作聯繫。1943 年春，在柏林方面的指示下，艾氏赴日直接與日軍參謀總部進行工作會談，起初日方強調在其主權範圍

38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 428.

39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p. 423-424.

40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不容許外國勢力的情報活動，德國在華一切有組織的情報活動唯有與日方合作，並在日方監督下，始有可能進行。[41]此外，出於「日蘇中立條約」（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的政治考量，[42]日方禁止德國在其附庸滿洲國境內發展情報組織以及從事對蘇聯的情報工作。[43]

雙方經過長達半年的交涉，最後階段由艾氏在南京與日本駐華派遣軍參謀長松井太久郎（Takuro Matsui, 1887-1969）中將及其情報參謀等會談，[44]在德方同意與日軍分享所有相關情報的條件下，雙方始達成協議。日方同意艾氏以設立無線電監聽站與透過一般性情報活動等方式，進行情報蒐集；運用情報人員進行滲透與破壞等秘密行動，則不在許可之列。[45]協議中對德方較具有實質意義的是，日方允許德國情報機關在北京與廣州建立情報站，同時指定其對口單位的負責人分別為北京日軍

41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2.

42 「日蘇中立條約」是日本與蘇聯於 1941 年 4 月 13 日簽訂，目的在使雙方於戰爭中相互保證中立。條約是在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與日本為減少北方軍事壓力而實施南進戰略的背景下，以犧牲中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簽訂的。條約共分四條，主要內容是：雙方保證維護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保持中立。簽約同日，雙方還發表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參見 Hans-Adolf Jacobsen, *Der Weg zur Teilung der Welt: Politik und Strategie 1939-1945* (Koblenz/Bonn: Wehr und Wissen, 1983), Document 99.

43 PA, R101934, Stahmer an AA, 15 September 1943;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3.

44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p. 2013-2014. 松井太久郎於蘆溝橋事變時任北平特務機關長，後任第五師團長與汪精衛政府軍事顧問，1943-1945 年間出任駐華日軍參謀長。1945 年日本戰敗時，為駐守上海地區的第十三軍軍長，同年 9 月 15 日在杭州向國軍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投降。

45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4, book 8, p. 1100;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 427. 按照情報獲得的方式來區分，一般性情報活動乃是藉由間諜或情報人員透過各種管道（大部分為公開管道），蒐集對象國的報刊、書籍、年鑑、公報、文獻、通訊社電訊以及追蹤新聞報導等；或透過合法身分，如商人、新聞記者、旅行家、參訪團以及駐外人員等實地蒐獲，然後送交情報機關，通稱為「人工情報」。監聽則是利用無線電機具截收各種信號情報資料。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華北司令部情報科科長日高富明（Tomiaki Hidaka）上校，駐華派遣軍上海陸軍部情報科長森章（Akira Mori）中校，廣州則為第二十三軍參謀長岡田芳政（Yoshimasa Okada）上校等 3 人。[46]

隨著艾氏的任職以及情報組織的重行整編，不僅意味著軍情局內行政管轄權的遞嬗，意即由席夫肯時代，該單位隸屬於海軍情報科，而改隸為經濟情報科指揮。同時也代表該機關已從一個著眼於海上商業戰的情報蒐集單位，蛻變為陸海空與經濟聯合情報作戰中心，情蒐範圍更從少數城市點擴展到整個遠東地區面。此外，該機關與駐華日軍情報機構的關係也產生實質變化，由於任務性質不同，其主要工作聯繫對象也由原先的日本海軍情報單位轉換為陸軍情報單位。

重組後的「艾爾哈特機關」，總部棲身於德國大使館上海辦事處內（位於北京路 2 號），內部除設置出納組（Kassenabteilung），負責分配工作經費外，直轄上海工作站，站長由艾氏副手拉特耶（Johannes Rathje）兼任。工作站又分為航空情報（Referat Luft）、海軍情報（Referat Marine）、蘇聯情報（Referat Sowjetruβland）、監聽（Referat Abhördienst）以及通訊（Referat Nachrichten）等組，分別由拉特耶、魯德洛夫（Ingward Rudloff）、摩斯貝爾格（Hans Mosberg）、哈本尼希特（Bodo Habenicht）與李希特（Walter Richter）等人負責。該組織每月工作經費約在 25,000 至 40,000 馬克之譜，其中 40%用於人事費用與辦公費用，30%支付不同國籍的情報員及線民，15%屬於特支費用，另 15%為預備金（退撫基金以及特別用途），[47]工作經費並不算充裕。

---

46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p. 2013-2014. 日本侵華後，在中國建立了為數眾多的軍事情報機構，東北、華北、華中與華南各地主要駐軍司令部中參謀部情報科以及各重要城市的憲兵隊等均屬之。「艾爾哈特機關」在華主要聯繫與合作的日軍情報機構為駐華派遣軍所屬上海陸軍部（Shanghai Army Office，即原上海特務機關，1942 年 8 月改名），其部長職由該司令部副參謀長兼領。藉由此機構，德國在華情報機關與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部中參謀部情報科三者形成了共生聯結。

47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基於情報工作的秘密性與安全考量，艾氏卻將其辦公處所設置於德國染料公司大樓頂樓，上海站則位於小沙渡路（Ferry Rd.，今西康路）225 號。另外，監聽站（代號 Seehaus）位於貝當路（Petain Avenue，今衡山路），而配備輸出功率達 7.5 千瓦收發報機的無線電短波電臺則位於大西路（Great Western Rd.，今延安中、西路，金陵西路）。[48]

至於情報機關的成員來源方面，並非都由德國國內直接派遣，大多數是在中國本地召募，特別是從具有在華工作經驗的德籍人士中挑選，例如服務於德國商社在華分公司或歐亞航空公司（Eurasia）的職員等。[49]此外，該機關也利用德籍猶太人為其蒐集情報，上海站蘇聯情報組負責人摩斯貝爾格即為一例。[50]而 1941 年 12 月德國對美宣戰後，大量遭美、加兩國驅逐出境的德籍外交人員與情報人員一度湧至上海，也為該機關提供了另一個專業人力資源的管道。[51]

以情報研析範圍區分，「艾爾哈特機關」在華情報蒐集的觸角延伸至一般軍事、軍事技術、經濟與政治等領域。然而根據與日本軍方的工作協議，「艾爾哈特機關」進行情報蒐集工作侷限於一般性情報活動與監聽兩種方式。兩者之中，蒐集資料最多而且層面最廣的厥為通過監聽所獲得的信號情報。信號情報最主要是指通信情報，即由無線電與電報所傳送的訊息。[52]

事實上，德國在華情報機關刺探敵方情報最主要與最有效的手段，即是通過散布於上海、北京與廣州的無線電監聽站。由於東西方地理位

48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book 13, pp. 2107-2108.

49 PA, R 27198, Anlage zum Bericht Nr. 470 der Botschaft in Shanghai, 27 February 1940, p. 6. 中德合資的歐亞航空公司於 1931 年成立，主要飛行路線為：一、上海－西安－塔城；二、北京－漢口－廣州；三、上海－北京－滿州里；四、成都－昆明。

50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67; Ernest G. Heppner, *Fluchtort Shanghai: Erinnerungen 1938-1948* (Bonn: Weidle Verlag, 1998), p. 225.

51 John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pp. 343, 347-348. 被驅逐出境的德國人之所以能夠到上海來，是因為當時上海的公共租界是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簽證就可以登岸的港口。

52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3.

臺灣本位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相距遼闊，因此敵對雙方在傳遞機密訊息方面，均相當依賴無線電通訊，因此監聽敵方的無線電通訊工作，成為一種最便捷有效的情蒐方式。而監聽最主要的目標還是竊取敵方的戰略情報，透過電信監聽和破譯密碼的方式，獲得包括國防政策、軍事戰略、戰略資源以及武器裝備研發等軍事為主的情報。

上海監聽站每日截聽來自倫敦、莫斯科、新德里、舊金山與重慶等地的電訊，並由速記員將內容筆記整理，該站曾截獲美軍運送軍事補給與民生物資至蘇聯的重要情報。[53]該站監聽對象也包括昆明的中國航空公司（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的無線電訊號，以及中國境內英美秘密電臺，特別是英美駐華軍事單位與重慶國民政府間的各種無線電通訊。[54]

1943 年中，北京及廣州的監聽站也陸續開始運作，各站約維持有 30 至 40 名工作人員，包括無線電操作員、密碼員以及技術人員，專責無線電監聽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德國或義大利商輪上的專門技術人員召募而來。[55]而在華監聽工作範圍最廣的首推北京站，因其地理位置鄰近蘇聯與外蒙古邊界，成為監聽蘇聯軍事動態的最佳場所，而北京監聽站在日軍的同意下，設置於義大利使館區內。1943 年底，北京與廣州的無線電監聽站每日最高可截聽 2,000 則來自上百處英、美、蘇等國軍事基地電臺的電訊。[56]

而以德國染料公司貿易商身分掩護的北京情報站站長傅爾克魯格（Siegfried Fuellkrug），其主要任務為蒐集滿洲國、蒙古與西伯利亞地區的蘇聯情報，以及美國太平洋地區的海、空軍情報。副站長海斯希（Dr. Walter Heissig），則是一位蒙古文化專家，專責將截獲自烏蘭巴托（Ulan Bator）的蒙文摩斯電碼翻譯成德文。北京站所獲得有關蘇聯的情報，對

53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9.

54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 428.

55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p. 226-227.

56 Astrid Freyeisen, *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p. 380-3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柏林而言格外具有意義，因為它不僅成為評估蘇聯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參考，更是判斷西方同盟國與蘇聯之間彼此合作強度的重要依據。[57]

1943 年底，廣州監聽站密碼技術人員曾成功破譯美國海軍海岸通訊密碼，德國軍情單位得以藉此偵測美國海軍在東亞地區近海的海軍戰術行動。[58]而較監聽站稍晚，於 1944 年 3 月始運作的廣州情報站，其負責人海瑟（Erich Heise）早年曾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鮑爾（Max H. Bauer）上校底下任職砲兵顧問，後於桂系軍中任軍事顧問長達十一年。廣州站的首要工作任務在於蒐集在華美軍空軍基地情報，海瑟曾以德國貿易商身分為掩護，親自對南寧、柳州、桂林、昆明與重慶的美軍機場進行間諜活動；同時監聽位於中印邊界查布阿（Chabua）美軍空運指揮部（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與昆明第十四航空隊（即著名的「飛虎隊」）的通訊，以蒐集美軍軍機起降時間、數量與飛行路線等重要飛航情報。此外也運用華人作為情報內線，蒐集盟軍在中國與印度的軍事部署與運補路線。廣州站對於中印間駝峰（the Hump）飛航資訊與盟軍軍隊補給的情報掌握，對日軍在華南的情報工作助益甚大。[59]

「艾爾哈特機關」情蒐對象也包括重慶的國民政府，其主要方式是利用居住在大後方的德籍人士，協助蒐集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60] 1938 年夏，德國政府曾電令全體在華軍事顧問團成員回國，但仍有部分成員並未遵從柏林指令，選擇滯留中國，繼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其中包括希特勒的政敵，1933 年逃離德國的前納粹黨突擊隊（Sturmabteilung, SA）指揮官，抵華後成為蔣介石衛隊顧問的史坦納斯（Walter Stennes）。史氏曾隨國民政府撤退至重慶，成為潛伏在國民政府中的情報內線。[61]戰

57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3.

58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 427.

59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Office of the Staff Judge Advocate to Chief of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5 May 1947, pp. 32-33.

60 BA-MA, RH2/1255, Bericht an Fremde Heere Ost/Pazifik Gruppe, 30 April 1942.

61 Walter Schellenberg, *Hitlers letzter Geheimdienstchef*, p. 182;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席夫肯作證指出，史氏在 1940 年曾提供德國在華情報機關美軍在重慶的防空武器系統的相關情報。[62]

另一位潛伏在國民政府轄區內的秘密情報人員，則是以納粹黨機關報《國民觀察者》（*Der Völkische Beobachter*）記者身分為掩護的申克（Wolfgang Schenke）。申氏早在中日戰爭爆發時，即被軍情局陸軍情報科派至中國，觀察中日戰爭的進展，後隨戰事發展，從漢口遷至重慶。申氏以新聞記者身分，周旋於國民黨軍政高層與德國國內政府官員之間，儼然成為兩者間非官方的聯繫管道。[63]在申克呈給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曾分析重慶國民政府的對德政策，特別是德、義、日三國成立軍事同盟後，重慶的軍事高層仍維持一貫親德立場，並對德國結束歐洲戰爭持樂觀態度，因此建議加強對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俟機將國民政府從英美陣營中分離出來。[64]事實上，德國進攻蘇聯後，德方也曾利用國民政府作為德國與英美對話的管道，將德國希望與西方和平共存的願望傳達給英美兩國。[65]

德國軍事情報機關對國民政府的情報蒐集範圍包涵極廣，舉凡從國軍軍事部署、軍力遞變、中等學校實施軍訓教育、[66]增兵入緬作戰序列、遠征軍司令部的編裝（武器、裝備、建置等），到中日戰爭的進展，以及日軍在中國戰場受牽制的程度等情資，均在調查之列。[67]根據當時一份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密令：

> 德國情報機關現正關心重慶之情況，根據每日自仰光、雲南發往柏

Geheimdienst: Ostfront, pp. 262-263.

62 NARA, RG 226, entry 182-A, box 8, folder 62, Statement Siefken, 21 January 1946.

63 BA-MA, N246/14, Schenke an General von Falkenhausen, 18 August 1947.

64 BA Berlin, R 901/60533, Auswärtiges Amt/Persönliches Pressearchiv von Ribbentrop, pp. 38, 44-45.

65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外交類：對德國外交》，第 60 卷，文號 8：齊焌簽呈，瑞士，1941 年 11 月 18 日。

66 BA-MA, RH2/1255, Entwicklung der Gesamtkriegslage 1942 in China, 7 January 1943.

67 BA-MA, RH2/1255, Bericht KO China, 10 February 19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林與上海之報告，努力蒐集重慶之軍事情形。並展開對德國在雲南昆明市、畹町二處之情報機關活動之偵察。曾於德僑住處搜獲多份報告，一件系調查國軍部隊使用之兵器裝備，一份系報告新疆政經情勢，另一件則為國民政府退出南京時詳情。[68]

不難看出德國情報機關在後方地區對國民政府進行情報活動的梗概。

不過，軍情局對於其在華情報機關蒐集有關同盟國軍隊駐地、部隊調動與後勤補給等戰術情報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對敵方戰爭潛力相關的戰略情報。柏林方面所亟需的是能提供軍事決策評估的戰爭態勢、戰時經濟發展趨勢、糧食生產供需情形、運輸與通訊系統以及政治情勢等情報，亦即可能成為影響戰爭發展之重大變數的相關情報。[69] 1944 年 4 月，同盟國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時機已迫在眉睫，德國將面臨在歐洲大陸兩線作戰的困境，在此關鍵時刻，德國盟邦日本對蘇聯的中立立場變化與否，對德國在東線的軍事作戰顯得格外重要。[70]因此，國防軍總部遂要求駐日武官以及「艾爾哈特機關」即時呈報日本軍事情勢與日蘇關係發展的情報，作為軍事高層規劃東線總體防禦與作戰計畫時的參考。[71]

雖然「艾爾哈特機關」定期向柏林匯報有關日本在戰時船艦損失、鋼鐵短缺、西印度地區原油開發與其佔領區政策等相關軍事情報。不過，顯然艾氏在這方面的整體工作表現，未盡符合柏林方面的預期，即使在

---

68 〈軍委會昆明行營關于查緝德國間諜在華活動事致外交部駐滇特派員密令〉，1942 年 3 月 4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493-494。

69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4.

70 BA-MA, RW4, vol. 693, Bericht KO China, 19 May 1944. 事實上，日本對蘇聯的中立立場並未鬆動，日蘇更於 5 月初達成一項協議，日本允許美、加船隻無障礙通過西伯利亞勘察加半島（Kamchatka）與日據千島群島（Kuril Islands）之間海峽，抵達濱鄂霍次克海的蘇聯海港廟街（Nikolajewsk）與亞揚（Ajan）等。亦即日方開放北美與蘇聯間的北太平洋航道，條件是往來船隻必須由蘇聯艦隻護航與懸掛蘇聯旗幟，同時日軍並擁有與蘇聯官方合作檢查船艦之權利。對蘇聯而言，此協議減輕了原本在更偏北極圈的港口卸載物資，再轉運至內陸與歐洲本土所造成的交通不便與成本支出。

71 BA-MA, RW4, vol. 693, WFSt/IC, F. H. Qu, 28 April 194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工作期間，艾氏也曾獲頒戰時功績十字勳章（War Merit Cross 2nd and 1st class with Swords），但是在 1944 年的工作評鑑中，其直屬上級除肯定艾氏的人格特質與工作能力之外，對於其整體工作績效僅給予「普通」的評價。[72]

和柏林軍情局不同的是，日軍情報單位對於「艾爾哈特機關」在華的情報工作卻表現出高度關注。事實上，由於文化與語言上的相似性，使得德方能快速並有效率地將有關英美盟軍在華的一般性情報，以及其他對於戰爭態勢具有研判價值的情報提供給日方，這是德國情報單位在蒐集英美情報工作上，較日軍情報機關具有的優勢。此外，日方對於「艾爾哈特機關」在各地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對德人社群的動員能力亦深感興趣，日方更曾慫恿艾氏脫離德國大使館體制，在日軍羽翼下獨立運作，意圖對「艾爾哈特機關」施加更多影響力。[73]

1944 年中，德國高層情報體系進行組織調整，由國家安全局兼領軍情局的業務，因此，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也欲利用此機會，接管原屬軍情局的「艾爾哈特機關」。秘密警察胡伯少校並特別赴日尋求日本軍方支持。不過日本軍方對艾氏及其組織的合作與工作信任關係顯然並未受德國國內事件的影響，不僅拒絕秘密警察要求，並威脅如果德方強行改組在華情報機關，日方不排除採取報復措施，禁止德國在華一切的情報活動。[74]在德國投降後，東京日軍參謀總部曾電令駐華派遣軍情報部門設法說服艾氏及其所屬單位，與日軍在情報工作方面繼續合作，[75]足以說明該機關在日軍心目中的特殊意義。

事實上，「艾爾哈特機關」在華工作的主要競爭對手正是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根據 1942 年軍情局與國家安全局間簽署的有關工作劃分原則的文件，將前者的工作重點定調在獲取敵國或潛在敵國的軍事情

72 NARA, RG 242, Eisenträger: Beurteilung, 1 April 1944.

73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5.

74 NARA, RG 226, entry 182, box 10, folder 67;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 257.

75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2, book 3, Statement Takashi Hidaka, p. 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報，並採取適當預防或反制措施，同時強調秘密情報活動僅屬於軍情局的任務。而後者工作重點則在於內部政治偵防，對於反政府與被定位為國家敵人等對象進行調查與監控，並採取一切措施防制其陰謀顛覆作為。不過文件中也附帶說明，由於外國的情報活動帶有政治顛覆與恐怖破壞行動等性質，因此反情報秘密行動亦屬國家安全局未來的工作任務之一，[76]為國外情報處預留了在華從事秘密情報活動的空間。

早在 1938 年初，該處的漢堡情報站就曾蒐集到國民政府代表孫科於阿姆斯特丹舉行駐歐外交使節秘密會議的情報，並掌握其中有關未來調整外交路線與對蘇聯關係的具體內容。[77] 1943 至 1944 年間，國民政府透過其在瑞士與法國維琪政府的情報管道，與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取得秘密聯繫，再次探詢德國介入調停中日戰爭的可能性，中方並提出情報合作的互惠條件做為報償。由於國民政府是極少數與德國的主要敵人英、美、蘇等國均維繫著同盟關係的國家，因此這樣的條件對德國情報單位而言，極具吸引力。不過由於中日雙方對於停戰條件的認知基礎差異太大，使得德國情報機關在戰爭期間最後一次調停中日戰爭的嘗試歸於徒然。[78]

四、德國投降後「艾爾哈特機關」在中國的情報活動

（一）與日本軍方繼續合作

自 1944 年底，隨著戰事逐漸迫近德國國境，由「艾爾哈特機關」提供有關美蘇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情報，在德國總體軍事戰略上所表徵的作

76 BA-MA, RW5, vol. 690, Grundsätze für die Zusammenarbeit des SD und den Abwehrdienststellen der Wehrmacht, 1 March 1942, pp. 1-6.

77 BA-MA, R58/2026, Bericht Geheime Staatspolizei, 19 January 1938.

78 Walter Schellenberg, *Hitlers letzter Geheimdienstchef*, pp. 280-2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與意義也日漸式微。[79]此外，1945 年 4 月中，該機關與柏林軍情局總部的電訊聯絡即已完全中斷，艾氏不僅要單獨面對機關未來存續問題，還要承受來自日本陸軍要求在德國即將戰敗投降的情形下，繼續與之合作的沉重壓力。[80]事實上，早在 3 月初，艾氏便召集北京與廣州站負責人同赴上海，商討該組織的未來運作以及與日本軍方繼續合作之利弊，同時為確保會談內容不致洩露，會談採面議而非電報往來方式進行。[81]此次會談廣州站長並未前來，僅由艾氏與北京站站長商談，會中兩人並就如何面對日本軍方所提出的繼續合作要求、在德國戰敗的情況下是否解散情報組織，以及以何種方式和日軍情報單位作切割等主要問題尋求共識。在艾氏的認知中，唯有德國仍處於戰爭狀態，他始有義務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而要有效斷絕與日本既有的情報合作關係，解散原單位是先決條件。兩人商議的結論是在德國戰敗投降的情況下，情報機關應該立即解散，不宜在日軍保護下為其工作。不過他們也認識到組織解散後，所有機關成員即為自由之身，不再受原組織工作上的約束。[82]

為避免會談內容洩露，而遭日軍偵知德方意圖，艾氏並未將會議討論結果電告廣州站負責人。不過，4 月間艾氏曾兩次以電報指示廣州站，在德國即將崩潰的態勢下，顧慮到日軍可能介入或強行徵收德國在華情報機關的行動，應先銷毀重要文件以及保護相關資產，以免蒙受不必要的財務損失。[83]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後，日軍森章中校立即派代表指示艾氏妥善保護該單位原有裝備，不得破壞，並準備移交日軍，且建議其自由裁量是否與日軍繼續合作；同時以保護機關人員不受英、美、蘇外交單位騷擾為名義，將艾氏及其所部等集中遷入位於小沙渡路原情報機關辦公室之建築物內，周

79 Astrid Freyeisen, *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 389.

80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23.

81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18.

82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20.

83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邊並由日軍設立障礙與營壘阻絕，禁制區外並有日軍哨兵戒護。[84]

5 月 12 日，在已無法獲得軍情局正式命令的情況下，艾氏自行下達指令，分別通電北京、廣州站，主要內容為：一、德國投降後該機關正式解編；二、清點裝備準備移交日軍；三、關於成員是否繼續與日軍合作或為其工作問題，交由個人決定。[85]同時艾氏也指示各單位採取預防措施，單位中機密文件、顯微縮影機器以及密寫墨水材料等重要裝備應一律銷毀，以避免由德人研發的機密技術落入日軍手中。[86]而對於第三項問題，事實上，艾氏採取了規避責任的態度，將問題轉嫁給下屬，由其自行決定是否繼續與日軍合作。

四日後，德國駐華大使館與外交單位亦遭汪精衛政權要求停止執行職務，並禁止收發密碼電報。[87]隨後大使館更被迫將上海的廣播電臺（XGRS）全部機件轉送給汪精衛政府。[88]而德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雖然形式上已解編，並完成裝備移交，但日軍並未對原機構進行人事重組，因此在日方提供糧餉補給的條件下，原機關成員在日軍監護下仍繼續偵蒐美軍及同盟國陸、海、空軍事行動的情報。[89]廣州站負責人海瑟在戰後受美軍審訊時承認，德國投降後，其情報站仍截聽美軍在沖繩島戰役（Battle of Okinawa）中的戰鬥通訊以及海空軍通訊，提供日軍參考。他也是首位承認在這段期間仍與日軍進行情報合作的德國情報官員，不過他強調，情報站乃是在艾氏與總領事館默許的情形下行動。[90]事實上，

84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2, pp. 2005-2006.

85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p. 2020-2021.

86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56; box 1416, book 14, p. 2210.

87 〈外交部致德國大使館節略〉，1945 年 5 月 16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頁 520。

88 〈德國駐華大使館致外交部函〉，1945 年 6 月 11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頁 521。

89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Special Orders, 10 May 1947, pp. 1-2.

90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德國駐廣州總領事席伯特（Dr. Franz Siebert）於 5 月 15 日曾召集德籍商業團體，要求他們提出持有的戰爭物資清單，並於 6 月初將其轉交日軍，以利後者在戰爭中支配利用。[91]至於北京站則不僅繼續蒐集美軍計畫在華北登陸的軍事情報，更將每日截聽的美國廣播電臺中有關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情報傳遞給日本，使得日本軍方持續獲得德國在華情報人員的情報挹注。[92]此外，北京站長傅爾克魯格與副站長海斯希亦承認，曾於 1945 年 6 月中協助華北日軍情報官員，審訊三名在中國執行轟炸任務遭擊落的美國飛行員戰俘。[93]

不過，隨著日本的投降，德國在華情報機關的活動就此劃上句點。機關成員與居留在華的德僑開始顯得惴惴不安，京、滬、平、津等地流言四起，傳出德僑一如日俘，將遭拘捕集中審訊，甚至謠傳德國僑民將被遣送至西伯利亞作奴工。[94]雖然已有來自美蘇方面要求全面遣返德僑的呼聲，但隨後各地德國社區又恢復了有組織的活動。許多納粹黨員，特別是技術人員與工程師等，在戰後仍想居留中國避難，以重建他們在戰時的經濟勢力，並逃避遣返德國後將面臨的艱困生活；而中國則需借重他們熟練的技術與專業知識，從事戰後重建工作。[95]有些尚未遭拘捕的納粹黨成員，則著手將原國家社會主義式的社團組織改頭換面，繼續推動所謂的民族使命，當時德國大使館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阿登堡（Dr. Felix Altenburg）即為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96] 1945 年 8 月，上海

91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Special Orders, 10 May 1947, pp. 1-2.

92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3, book 4, Statement Tomiaki Hidaka, p. 495.

93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3.

94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朱家驊呈蔣介石〉，1945 年 10 月 9 日。

95 NARA, RG 226, entry 212, box 5, “China Theater, X-2 Branch,” Report regarding the German espionage agents and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and Peking, 6 Sepember 1945, p. 2. 當時居住於上海的德籍人數約在 2,800 人，北京則在 200 至 250 人之譜，廣州則僅約 50 人左右。

96 NARA, RG 226, entry 212, box 5, “China Theater, X-2 Branch,” Report on German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德國社區協會舉辦理事改選，納粹黨成員仍然獲得壓倒性勝利，這個結果無異表徵在上海的大多數德僑對於他們已戰敗的國家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路線，仍然保持相當程度的認同。

（二）國民政府與駐華美軍遣返德僑的立場

雖然國民政府於 1941 年 12 月初珍珠港事變後即對德國宣戰，但在戰爭期間雙方並未有任何實際的戰爭行為，國民政府不僅對於轄區內的德籍人士聽其自由居住，更責成「中德文化協會」對德僑在各需求面上提供援助。[97]不過，在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不得不面對與處理滯留中國的德僑問題。雖然日俘以及日僑均於指定地區集中管理，以便遣返日本，但對於德僑問題，國民政府卻始終採取差別處理，並未對其施以大規模集中管理。[98]蔣介石於 1945 年 11 月曾指示處理德僑的基本方針：「在原則上，德僑不應如日僑同樣之處理，除犯有戰爭罪責者，應予拘辦外，其餘宜應從寬處理。」[99]至於遣返德僑問題，在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亦留用不少的德籍技術人員，並未將其遣送回國。此現象曾引起美國政府的高度關切，當時來華調停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將軍，在 1946 年致國民政府備忘錄中有云：

> 中國戰區德僑，因中國政府需留用若干技術人員，遂緩遣送。……惟余覺留用之德僑不應有納粹黨員，……現在中國四二〇〇名德僑

---

espionage agents in Peking, 22 October 1945, p. 1.

97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朱家驊呈蔣介石〉，1945 年 10 月 9 日。

98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軍統局上海站毛森報告〉，1945 年 12 月 23 日。1945 年 10 月 13 日，上海市政府成立「德僑事務委員會」（German Affairs Commission），作為管理滯留上海地區德僑的主管機構，同時開始將德國政府官員、黨部負責人及其眷屬等集中於江灣地區的拘留中心。事實上，在約 2,800 餘名上海德僑之中，除上述政府與黨務機構官員約 120 名遭集中管束外，其餘均仍照常自由行動。此外，德僑產業亦未全遭沒收，並且有充分時間將資產轉移及購買貴重金屬與外幣。

99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王世杰呈蔣介石〉，1945 年 11 月 16 日。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 中，至少有一五〇〇人納粹黨員或附敵有據者需立予遣送。中國政府似宜即將其予以拘禁並將其遣送。[100]

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 1897-1989）將軍亦曾代表美國政府，提醒國民政府應配合盟軍遣返政策，儘速將所有在中國的德僑遣返。[101]

對於美方提出遣返所有在華德僑的要求，國民政府除否認有留用納粹黨籍德僑情事外，亦由外交部對外強調：

> 中國政府一向決定將有納粹黨籍或從事納粹活動之德人加以遣送，但對若干德僑是否納粹黨員不甚明顯，而經調查並無損害中國或盟邦之行為者，可予緩送。在核准緩送時，對於中國公私機關團體僱用之技術人材，其工作為目前所必需者得予特別考慮，上述政策係決定各德僑遣送及緩遣之準繩，……中國政府對於本國及盟方所供給之消息，自須慎重審核，各方對於若干案情，雖有不同之意見，然遣送及緩遣名單之最後決定，都全由中國政府負責。[102]

由此可見，國民政府明顯地在遣送全體德僑的問題上持保留態度。

不過，對於所謂「損害中國或盟邦之行為者」，駐華美軍自 1945 年底起，即著手調查戰時德國在華情報機構及其活動，並自 1946 年 4 月起，將艾森特雷格與其僚屬陸續拘捕，[103]羈押於上海華德路提籃橋監獄（Ward Road Jail）。[104]隨後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上海籌組美軍軍事法庭，

100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Memorandum for Chiang Kai-shek〉，11 March 1946。

101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Wedemeyer to Chiang Kai-shek〉，30 March 1946。

102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關於德僑處理請示〉，1946 年 4 月 5 日；《中央日報》，1946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第 2 版。

103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Croup, 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 2. 其中成員戴特勒夫斯（Hans Dethleffs）與魯德洛夫（Ingward Rudloff），在戰後曾以偽造證件試圖從青島逃亡海外，遭美軍陸戰隊第六師緝獲。

104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13, folder 14-H, roster of prisoners confined in Ward Road Jail. 提籃橋監獄坐落於華德路 117 號（今長陽路 147 號），最早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始建於清光緒 27 年（1901），由英國駐新加坡工程處設計得標，當年年底動工興建，啟用於光緒 29 年（1903）5 月。初建時，主要有兩幢四層樓的監樓，囚室 480 間，以及

為這批已遭美軍以違反無條件投降條款與從事間諜行動等罪名起訴之在押德籍戰犯的審理預作準備。[105]

（三）駐華美軍對「艾爾哈特機關」的審判

1946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 時，美國陸軍總部軍法處戰犯組（Office of Theater Judge Advocate War Crimes Branch）「戰犯委員會」（War Crimes Commission）在提籃橋監獄內成立軍事法庭，並首次對 21 名德國戰犯進行審理，首要戰犯即是德國軍事情報局駐華負責人艾森特雷格中校。[106]

艾氏與其部屬面臨的指控，主要為德國情報機關於戰爭期間在中國戰區針對盟軍所進行的間諜行動。特別是在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後，迄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三個月期間，該機關明知德國已簽署無條件投降，卻仍蓄意破壞條約精神，繼續與日軍合作，並提供日

炊場、辦公樓、醫務所等，佔地 10 畝左右。1916 年以後陸續向北面和東西向進行擴建和改建，30 年代初又拆除了部分初建時的建築，進行重建，直到 1935 年時基本定型。現存建築物均為 1917-1935 年間所建造，有 5 層監樓 9 幢，4 層、6 層監樓各 1 幢，還有工廠樓（5 層）、醫院（8 層）、辦公樓、瞭望樓等，共有建築面積 70,000 多平方公尺，監室 3,900 多間，占地面積 60.4 畝，四周有高 5 公尺多的圍牆。監獄主要關押對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內判處徒刑的中國籍犯人（開始只收押男犯，1904 年起兼收女犯，1906 年停止，1943 年 8 月恢復收押女犯；從 1935 年 9 月起亦關押外國籍犯人）。提籃橋監獄自啟用以來，到 1949 年 5 月間，先後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軍、汪精衛政府和國民政府的管理。抗戰勝利後，由國民政府接管，改稱為「司法行政部直轄上海監獄」，俗稱華德路監獄、提籃橋監獄或外國牢監與西牢等。參見《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頁，〈上海監獄志〉，第一章（http://www.shtong.gov.cn，200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105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13, folder 15, Memorandum of Nanking Headquarters Command/ Office of the Staff Judge Advocate, 17 August 1946.

106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press release/Army Advisory Group, 10 May 1947, pp. 1-2. 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被告律師、翻譯與記錄員等主要工作人員，均由美軍軍官擔任。法官以馬倫（Daniel H. Mallan）上校、貝瑞（Radford Berry）中校、李爾（James B. Leer）中校與普洛金（George C. Plotkin）上尉組成。檢察官由歐康諾（Jeremiah J.O'Connor）中校與德耶爾（Robert T. Dwyer）少校擔任，公設辯護律師為波戴恩（Edmund J. Bodine）中校與若耶爾（Charles Royer）中校。

臺灣公共電視 期刊資料庫

軍有關西方盟國的軍事情報。這種作為不僅象徵該機關與美國及其同盟國仍處於戰爭狀態，也協助日本對美國的戰爭行為，嚴重牴觸戰爭法則與國際慣例。[107]因此美軍以戰爭罪犯名義起訴艾氏及其部屬在德國無條件投降後，資助敵人從事戰爭行為。

對於美方的指控，雖然艾氏否認德國投降後該機關與日軍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協議存在，並強調在其認知中，無條件投降即意謂停止一切軍事戰鬥與解除戰備，[108]辯稱並不清楚無條件投降的內容細節，因此無法精確地理解其涵義，來為自己與日軍合作的行為辯護。[109]不過根據以證人身分出庭的前日軍上海情報官員森章中校作證時指出，德國投降後，日軍仍繼續收到來自原「艾爾哈特機關」的軍事情報，並且雙方合作的模式是建立在該機關每位工作成員自願具結的協議基礎上（關於此點，由於相關文件均已銷毀，無法證明）。[110]特別是艾氏機關所僱用的義大利無線電技術人員與廣州站站長等人，亦對上述德日情報合作的事實供認不諱。[111]雖然，所有德國被告對於美方的起訴事項均抗辯無罪，最終於 1947 年 1 月 17 日美軍軍事法庭宣判，德籍戰犯 21 人中，除艾森特雷格以違反德國無條件投降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外，其餘 20 人分別被判處五年至三十年徒刑不等（參見附表二）。[112]

全體德籍戰犯在判刑確定後，隨即於 2 月中經由美艦遣返德國巴伐利亞邦之蘭茲堡（Landsberg）監獄服刑，[113]該監獄亦為希特勒於 1923 年慕尼黑暴動失敗後所服刑之處。不過，由於東、西德分裂與「德國問

107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Special Orders, 10 May 1947, pp. 1-2.

108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6, book 14, p. 2249.

109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3, p. 2061.

110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2, book 2, Statement Akira Mori, pp. 176-177.

111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pp. 275-276.

112 《申報》，1947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第 5 版。

113 NARA,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press release/Army Advisory Group, 10 May 1947, p. 1. 蘭茲堡監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佔領德國巴伐利亞期間，於 1947 年 1 月 1 日針對德國戰犯所設立的戰犯監獄（War Criminals Pris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的深化，美國及其西方盟邦與蘇聯間的對抗氣氛愈益尖銳，在此國際情勢急劇變化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很快便失去清算德國戰爭罪行與追捕納粹戰犯的興趣，[114]取而代之的是籌劃在德國佔領區內儘速成立一個由西方控制的新政治勢力。此舉不僅可以填補中歐地區的政治權力真空，更能成為在美國主導下即將成立的軍事政治聯盟——北約組織——的實際防禦力量，以牽制蘇聯共產集團愈益增強的武力威脅。[115]因此，在此新形塑而成的國際關係架構下，這群前在華戰犯旋於 1950 年夏全部獲得美軍釋放，理由是他們在戰爭期間所犯的罪行「僅屬於技術層面，尚未達到實質性犯罪的層次」。[116]

五、結論

早在 1937 年 7 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開始，德國軍情局即派人赴上海秘密成立工作據點，負責東亞地區情報傳遞與蒐集西方各國的海事情報，成為日後德國在華情報組織的雛型。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不僅在歐洲戰區，更在第三國——中國建立情報機關，加強從事攸關戰爭發展的軍事、政治與經濟情報的間諜活動與情報蒐集。無論從中國戰略地理位置的優越性，或是從國民政府作為當時極少數能與英美蘇等國政府高層皆維持聯繫的國家之事實來考量，中國地區作為遠東情報活動的基地，對德國國家戰略布局中的情報作戰而言，都極具發展性。因此隨著德國在歐洲軍事行動的擴展，自 1941 年底起，其在華情報工作亦逐步組織化與規模化，進而在 1942 年底發展成為體制與功能齊備的軍事

114 Nobert Frei, *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dtv, 1999), pp. 302-303.

115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p. 98.

116 Charles Lane, "Shanghaied," *The Green Bag* (2D Series, Vol. 7), No. 3, p. 256; Ernest G. Heppner, *Fluchtort Shanghai*, p. 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報機關。綜觀戰爭期間，特別是 1942 年後，「艾爾哈特機關」將中國地區轉化為德國遠東情報活動的中樞，其在中國淪陷區內組織化的情報工作，不論在提升德國軍事情報工作能量或是支援軍事決策方面，對德國軍事情報組織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與價值。

不過，以上海為據點發展的德國情報機關，其組織規模與經費挹注卻遠不及德國在歐洲中立國家西班牙、瑞士與瑞典所設立的情報組織。[117] 上海固然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與金融中心，更是中國最大的國際貿易商港，對從事情報活動而言，具有工作上的便利性。然而，以上海為指揮中心的「艾爾哈特機關」，不僅情報活動與偵蒐場域幾乎涵蓋了整個東亞地區，遠較其他海外情報機關廣袤得多，其工作任務也從早期單一的海事情報逐漸擴大，包含蘇聯、英美遠東戰區、日蘇關係以及中日戰爭等情報在內。工作任務的廣泛也暴露該單位人力與經費不足的缺陷，而人力與經費的不足，使得在華軍事情報機關於執行情報任務時，不僅易造成該機關在情報蒐集工作上的負擔，也難以兼顧不同的工作面向，突顯情報工作的整體成效。[118]

除了任務龐雜、人力與經費不足外，納粹德國行政體系特有的「令出多門」（Polykratische Struktur）的疊床架屋式組織架構，也是影響在華軍事情報機關工作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119]事實上，如前所述，當時在華負有情報蒐集任務的德國官方機構中，屬於公開單位的主要有外交部所屬大使館、各地領事館以及上海新聞處。同時，納粹黨海外黨部所屬的中國總支部，於上海、天津、廣州、漢口、青島、濟南、北京等地亦設有分部，並自成一個情報體系。此外，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與秘密警察亦派有代表在華，並透過獨立的情報組織進行安全與情報工作。這種黨、政、軍系統各自發展情報組織與擁有情蒐管道的情形，具體反

117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pp. 246-250.

118 NARA,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MS#ETHINT-4, German-Japanese Collaboration, pp. 4-5.

119 Ulrich von Heh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München: Oldenbourg, 1996), pp. 4, 59-61.

臺灣本位學術期刊資料庫

映出納粹德國行政架構紊亂的特色，也成為各系統互不協調與彼此爭競的根源。在上述情報體系中，惟有軍方情報機構是屬於秘密單位，進行的是機密軍事情報活動，就工作內容而言，各單位的情報蒐集重點因單位屬性不同而有所區隔，不過對於整體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戰爭情勢評估，則各單位的任務顯然又有高度重疊性。

此外，駐華大使館也非情報工作最高指導與協調單位，因此在華的情報工作缺少統合性的機構，再加上情報工作本身的隱密特性，以致各單位自行建立情報通路，在本位主義下導致彼此爭競，互為消耗，自然無法發揮整體的工作成效。1943 至 1944 年間，中日雙方藉由德國互相試探和平的秘密行動，在完全排除「艾爾哈特機關」的參與下，而由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主導即為顯例。[120]再者，傳統上介於外交與軍事情報系統間的猜忌與隔閡始終存在，從席夫肯時代起，軍事情報單位就使用外交人員無法辨識的軍用密碼直接與柏林聯繫，並將機關主要辦公室由大使館遷出。從上述兩事可以看出，造成雙方嫌隙的主要原因出自於對彼此任務屬性的隔閡，與軍事情報工作對內部人員——外交官的絕對保密性所導致，這種情形即使在艾氏接管在華情報機關後，也未有明顯改善。在外交人員眼中，軍事情報單位一直是他們在職權範圍內無法掌握的一環，縱然情報官員皆掛名於使領館編制中，但駐外大使與總領事們對他們卻毫無職務管轄權，後者是直接領受軍情局以及國防軍總部的命令，因此德國在華外交與軍情兩個系統在一個組織架構下，始終處於磨合的互動狀態中。

最後，由於 1943 年中，駐華日本軍方對德國情報活動方式與範圍的嚴格設限，以及在日本對蘇聯中立政策的影響下，不僅將德國軍事情報機關定位為日軍的附屬，也使得德國在華情報活動運作的空間相對遭到壓縮，使其所獲得的情報在使用價值方面，大多侷限於事涉軍事行動的「戰術情報」，而非對提供國家高層擬定軍事決策時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戰略情報」。因此該機關的存在價值在德國總體戰爭中的重要性，

120 Walter Schellenberg, *Hitlers letzter Geheimdienstchef*, pp. 280-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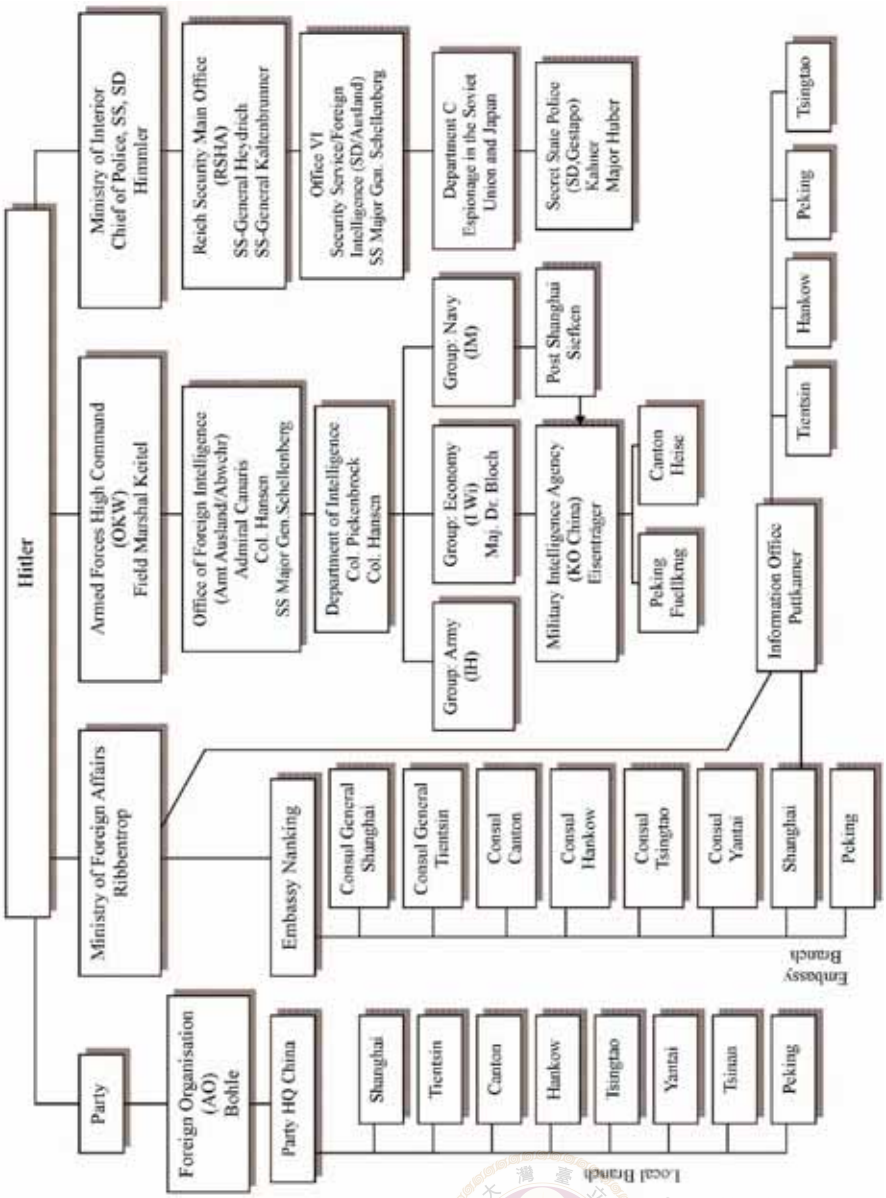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隨著德國在歐洲戰局的日益艱困而相對邊緣化。雖然該機關在通訊監聽方面累積了不少技術性的經驗與獲致相當的成果，不過顯然日軍對該機關整體工作效能的興趣與重視程度，遠超過了柏林的國防軍總部，最終導致在德國投降後，德國在華情報機關淪為在日軍保護傘下發揮其最後剩餘價值的角色。

（責任編輯：吳俊瑩　校對：劉昱妤　黃昱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　德國在華情報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NARA, RG 153, entry180, box 9, folder 13-B, Sketch of Franz Huber, 3 October 1946; Oskar Reile,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Ostfront*, pp. 456-4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 上海美軍軍事法庭審判德籍戰犯判決結果

序次	姓名	性別	年齡	戰爭期間擔任的職務	刑 期
1	Lothar Eisenträger	M	50	軍情局駐華情報機關負責人	Life
2	Jesco v. Puttkamer	M	43	外交部上海新聞處處長	30 years
3	Alfred Romain	M	29	上海新聞處文宣組組長	30 years
4	Hans Mosberg	M	50	上海站蘇聯情報組組長	20 years
5	Erich Heise	M	55	廣州站站長	20 years
6	Dr. Walter Heissig	M	33	北京站副站長	20 years
7	Siegfried Fuellkrug	M	39	北京站站長	20 years
8	Johannes Rathje	M	40	上海站空軍情報組組長	15 years
9	Ingward Rudloff	M	32	上海站海軍情報組組長	10 years
10	Bodo Habenicht	M	51	上海站監聽組組長	10 years
11	Hans Dethleffs	M	33	上海站密碼員	10 years
12	Walter Richter	M	40	上海站通訊組組長	10 years
13	Dr. Herbert Müller	M	61	德國通訊社華北地區負責人	10 years
14	Hermann Jäger	M	40	上海站情報員	10 years
15	Dr. Felix Altenburg	M	58	德國大使館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8 years
16	Heinz Peerschke	M	31	上海站微縮影像專家	5 years
17	Maria Muller	F	38	北京站職員	5 years
18	Oswald Ulbricht	M	32	廣州站無線電技師	5 years
19	August Stock	M	22	北京站職員	5 years
20	Dr. Franz Siebert	M	55	廣州總領事	5 years
21	Hans Niemann	M	25	廣州站無線電技師	5 years

資料來源：NARA, RG 153, entry180, box 9, folder 13-B,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Special Orders, 10 May 1947, pp. 1-8; Army Advisory Group/China, Memorandum, 15 February 1947, pp.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外交類：對德國外交》，第 60 卷。
程玉凰編纂，《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上冊。臺北：國史館，1984。
國防部，《國軍檔案》，檔號 063.16010，日德僑民遣送回國案。
Bundesarchiv, Berlin (BA Berlin)
NS 9 R 187/293 R 901/60533 R 9208/4637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BA-MA)
R 58/2026 RH 2/1255 RW4 Vol.693 RW5 Vol.690 N 246/14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2, Book 2-3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3, Book 4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4, Book 8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5, Book 12-13
RG 153, Entry 143, Box 1416, Book 14
RG 153, Entry 180, Box 9, Folder 13-B
RG 153, Entry 180, Box 13, Folder 14-H, 15
RG 226, Entry 182, Box 10, Folder 67
RG 226, Entry 182, Box 28, Folder 152
RG 226, Entry 182-A, Box 8, Folder 62
RG 226, Entry 211, Box 23
RG 226, Entry 212, Box 5
RG 242, German Army Officer Personnel Files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MS#ETHINT-4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PA)
Inland IIg 76, Fiche 1926
R 27198 R 101934 R 102049
Geheimakten 1920-1936, Ostasien

二、專書

Buchheit, Gert. *Der deutsche Geheimdienst: Geschichte der militärischen Abwehr*. München: List, 1966.
Frei, Nobert. *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dtv, 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eyeisen, Astrid. *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0.

Hehl, Ulrich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München: Oldenbourg, 1996.

Heppner, Ernest G. *Fluchtort Shanghai: Erinnerungen 1938-1948*. Bonn: Weidle Verlag, 1998.

Jacobsen, Hans-Adolf. *Der Weg zur Teilung der Welt: Politik und Strategie 1939-1945.* Koblenz / Bonn: Wehr und Wissen, 1983.

Kahn, David.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Da Capo, 2000.

Leverkühn, Paul. *Der geheime Nachrichtendienst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m Kriege*. Frankfurt a.M.: Bernard & Graefe, 1960.

Mader, Julius. *Hitlers Spionagegenerale sagen aus: Ein Dokumentarbericht über Aufbau, Struktur und Operationen des OKW-Geheimdienstamtes Ausland/Abwehr mit einer Chronologie seiner Einsätze von 1933 bis 1944.* Berlin: Verlag der Nation, 1983.

Mallmann-Showell, J. P. *Das Buch der deutschen Kriegsmarine 1935-1945*. Stuttgart: Motorbuch, 1995.

Powell, 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Reile, Oskar. *Der duetsche Geheimdienst im II. Weltkrieg: Ostfront.* München: Weltbild, 1989.

Schellenberg, Walter. *Hitlers letzter Geheimdienstchef.* Rastatt: Moewig, 1986.

Shulsky, Abram N. and Schmitt, Gary J.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2.

Simpson, Christopher. *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ed. *Sta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Vols. 1937-1939. Berlin: Schmidt, 1937-1939.

Wasserstein, Bernard. *Secret War in Shanghai*.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Wickert, Erwin ed. *John Rabe: Der gute Deutsche von Nanking*. Stuttgart: DVA, 1997.

三、論文

Charles Lane, "Shanghaied," *The Green Bag*, 2D Series, Vol. 7, No. 3, 2004, Boston.

Donald M. McKale, "The Nazi Party in the Far East, 1931-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2:2, 1977, London.

四、報紙

〈納粹在華所組間諜網已破獲〉，1946 年 4 月 16 日，《申報》，3 版

〈滬納粹戰犯二十一人判決〉，1947 年 1 月 18 日，《申報》，5 版。

〈外交部發言人說明德僑遣送標準〉，1946 年 7 月 3 日，《中央日報》，2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 in China (1941-1945)

Chen, Chern*

Abstract

China and Germany cooperated closely in military and economic matters during the 1930s; but, following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change of Hitler'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ecame muggy. Then, due to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each of the belligerents put all of their forces into establishing informant nets in third countries and reinforcing their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military, politics and economy. To German intelligence, China—the centre of East Asia and the focus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s—not only possessed fine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it provided an ideal area for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spionage activity of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framework of its national strategy during the world war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espionage work conducted in the Japan-occupied China after 1941. Even though in 1941 Germany acknowledged that the puppet government of Wang Chin-Wei had caused the break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Kuomintang regime, but not until Nationalist China's 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effectively put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hip at an end. However, the German military authorities saw China's strategic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kang, Taipei 11529, Taiwan; E-mail: chen9@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que status a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that kept high level contact with England,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Germany thus used China as the base for its espionage activity in the Far East, especially for the gathering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on the war in its Far East theater.

Keyword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War II, informant nets, national strategy, military intellig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